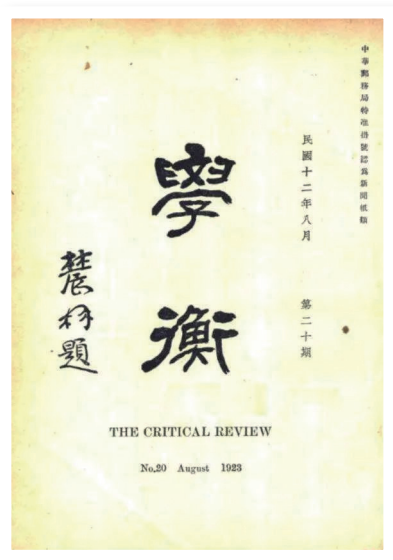


# 紀念但丁逝世七百周年—— 但丁在當代中國與臺灣

文·圖/李弘祺



《學衡》雜誌曾經登有多篇有關但丁的文字。吳宓是創始的編者之一。

但丁在20世紀早期的中國是很受歡迎的。從梁啟超到郭沫若，到錢稻孫，介紹但丁的人都是有名的作家，但是到了二次大戰結束，並沒有人把全本的《神曲》翻譯中文。大部分讀書人都是依靠短篇的介紹文字來認識他。在二次大戰之前，吳宓所翻譯的長文〈但丁神曲通論〉（1925），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一篇。這篇文章是翻譯自他的老師葛蘭堅（Charles Hall Grandgent）的作品。葛蘭堅的文章寫成到翻譯成中文間隔不是太遠，因此中國人對但丁的認識應該跟世界學術界的主流非常接近。吳宓是當時很受歡迎的《學衡》雜誌的出版人之一，與梅光迪及柳詒徵合作，在二十年代介紹西方近代文學理論（包括有名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新人文主義）有重要的貢獻。錢稻孫第一篇翻譯神曲的作品（〈地獄篇〉的第一到第五曲，1929）就是在《學衡》發表。

吳宓對臺灣的學生來說是陌生的，如果不是因為他的日記在大約30年前出版，引起一番興趣，他很可能會在華人世界裏被完全忘記。他個人對西方文學或思想其實沒有真正的嚮往，一輩子總是想要在中西文化中求取一種平衡（所以雜誌名為《學衡》），而最終潦倒而死，一事無成。

中日二次戰爭之前，但丁的《新生》



王維克先翻譯〈地獄篇〉，後來翻完全本《神曲》。

第一次翻譯為中文，由光明書局於1934年出版。翻譯者是王獨清（1898-1940）。王獨清曾經留學日本和西歐，後來加入創造社，有一段時間還主編《創造月刊》，是中共成立初期的黨員，不過很早就去世。

中日戰爭的戰火似乎使中國的作家們對《神曲》（特別是〈地獄篇〉）感到有一種心靈上的聯繫。1939年，江蘇金壇地方的中學校長王維克（1900-1952）出版了他所翻譯的〈地獄篇〉。王維克這個人最有名的是就是他發掘了華羅庚這個不世出的數學家。他們師生間的動人故事流傳很廣，不過這不是我們這裏的關心。可惜的是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們幾乎不知道王維克的其他事跡。我手上沒有他的翻譯，不然或許可以具體地看到他在戰火中翻譯〈地獄篇〉的心情。王維克後來終於把整本《神曲》都翻譯完成出版，時在1948年。再四年，他就去世了。

解放前中國對但丁的認識還應該加一句話，就是當時天主教會對但丁的介紹。天主教的雜誌像《公教月刊》（1940年代在滿洲出版）及上海的《益世報》都有有關但丁的文字發表。

從戰後到解放之間，中國對但丁的研究有了一個新的面貌。簡單地說，就是報章雜誌上面，介紹西方思想的作品大為減少，不再像民國時代那樣。1949-1969的二十年間，但丁的名字一共才出現了六次。其中只有一個作者是比較有名的，就是朱光潛（1897-1986）。朱先生留學英國和法國，但是按照最新一位意大利學者薩巴蒂尼（Mario Sabattini）的研究，朱光潛在美學理論上其實受到克羅采（Benedetto Croce）



《創造》月刊主要人物：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朱光潛。

更為明顯的影響，主要見於「移情」（empathy，現在多翻譯為同理心）的學說。20世紀不少思想家認為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使用不同的瞭解方式。前者就是這種將心比心的移情方法。他們普遍認為這個說法的始祖就是17世紀的維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無怪乎朱光潛晚年從事的就維科的注譯。

朱光潛在1956年翻譯了但丁的〈論俗語〉。但丁這篇短文基本上是在鼓吹地方方言的重要性。他提倡使用「方言」來寫作，這個我在上篇已經提到。意大利的語言被稱為是「但丁的語言」也就是這個原因。胡適提倡用白話文來「我手寫我口」，改變了中國超過一千年來用文言體裁寫作的習慣。文藝復興時代各國開始用本國口語寫作，這個發展曾經影響了胡適。

如上所說，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翻譯或寫作關於但丁作品的主要是學者，因此報刊雜誌不再像民國時代那麼重要。這種情形維持了近30年的時間。當時中國文學界因為馬克思思想的影響，許多文學家的理論基礎不僅薄弱，而且缺乏自由的想像力，所以但丁大致被視作對抗腐朽保守的天主教會的、具有現代性力量的代表。除外真的是乏善可陳。

繼王維克之後的是朱維基（1904-1971）。他在1954年開始出版《神曲》（北京：人民），採用的是白話文的新詩體裁。這本書讀起來還算暢順，也遵守原文的段落，但是由於他的《神曲》是由英文轉譯，未受到好評。

改革開放（1978）以後，中國學術界開始呼吸比較自由的空氣，所以有三本新的《神曲》的翻譯。譯者一個是北大的教授田德望，另一個是黑龍江大學的張曙光。第三個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黃文捷。一般似乎認為田德望的翻譯最為可取。

九十年代以來，譯介但丁的活動還有其他的面向，這裏無法一一介紹。下面只提兩個臺灣讀者會感到有趣的發展。第一個是比較屈原與但丁，其次是巴金取得國際但丁獎。

首先談但丁與屈原的比較。由於兩人都是偉大的詩人，都有流傳後世的重要作品，而且憂國憂民，卻不受統治者的重用，反而被放逐而流離失所，因此讓後代人在引用他們的作品之餘，生出濃厚的同情。第一個用心寫這個題目的是蘇茜。可惜這個人是誰，我完全無從查起。但是由於他（她）的文章（分上下兩期）是登在

1941年在上海出版的《東亞聯盟》，因此可能是活在汪精衛政權下的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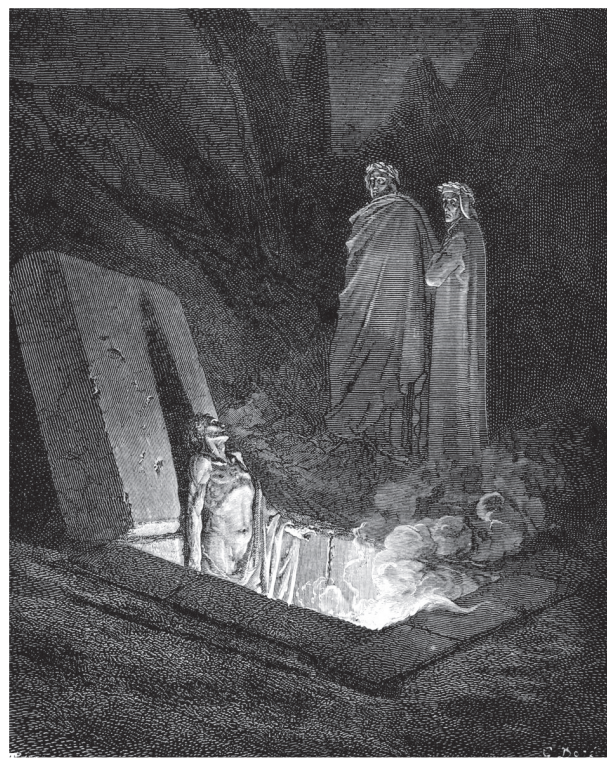
近二三十年來，很有趣的就是突然又有很多論文討論屈原與但丁的比較。如「但丁與屈原的不同點：但丁與屈原的差異性」、「屈原的香草與但丁的玫瑰」、「屈原和但丁的情感藝術比較」、「但丁的離騷」、「屈原和但丁」、「《神曲》與《離騷》共性初探」等等，不一而足。我個人的感覺是這些人多是集中在文學及文體上的比較。如果從歷史地位及意義上面來看，兩個人實在缺乏比較的基礎。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是巴金在1982年得到了意大利政府設立的但丁文學獎。這個實在是對中國人極大的諷刺。因為巴金年輕的時候其實是不喜歡但丁的。他完全是在文化大革命被關牛棚的時候才突然感受到但丁的人生和文學的悲劇特色。雖然《神曲》是稱為「神的喜劇」，但是讀它的人應該都會被但丁所描述的「地獄」和「煉獄」所吸引，感到人生的真實百態和不可捉摸，並在那裏面尋求某一種「希望」。巴金這麼說：「在『五·七幹校』邊種菜邊背誦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就是<地獄篇>）的漫長的日子裏，我的內心又漸漸產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對比之下，老舍是不是太早自殺了一點？

上面講的都是近代中國的但丁受容史。任何人都會感到中國近代作家或讀書人所看到的但丁完全是自己時代的反映。這一點毋庸置疑。



Gustav Dore (1832-1883) 繪，碧雅翠絲帶領但丁在天堂看見九層天使所包圍的上帝。



Gustav Dore 所繪的地獄一景；死了還掛心人世間政治的地獄亡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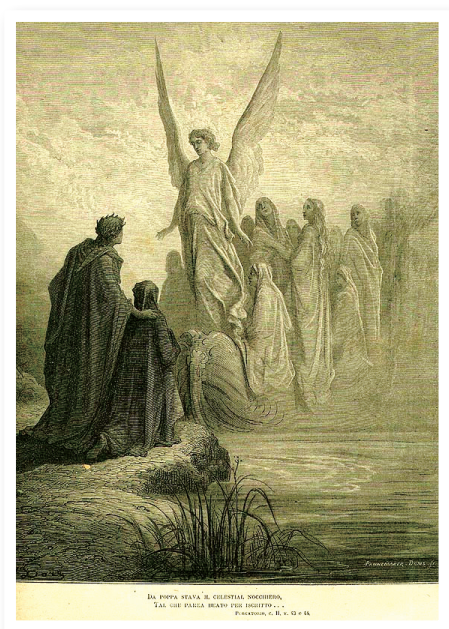
# 李弘祺 專欄

疑。如果是這樣，那麼在臺灣，感受或許就不一樣。在日本殖民臺灣時，讀書人主要是從日文的作品擷取西方的知識。在日本，第一個把《神曲》翻譯成日文的人是山川丙三郎（1876-1947；出版年代1914-1922），相信臺灣的人也是讀這本翻譯。我現在沒有時間去詳細檢索，不過倒是注意到1916年用教會羅馬字出版的《臺灣教會公報》第一次出現了“Dante”。文章（作者未具名）很短，是介紹意大利文化。它最後一句話是：「[意大利]也有幾個真出名的詩翁，有一個名號做Tàn-tē (Dante)，是五、六百年前的人，他著的書現時還在著，翻譯真多國的文字。」這是我暫時能找到臺灣人最早提到但丁的記錄。

戰後初期，臺灣居然有兩篇中文有關但丁的文字。一篇是羅靈智發表在《臺灣文化》的〈由《神曲》談但丁〉。文章很短，沒有什麼特色。而羅靈智是誰，不幸找不到。另外一篇是年輕的陸晞白寫的。二戰甫結束，浙江餘姚中學的陸晞白還沒有畢業就來了臺灣。他在1948年的《建國月刊》發表了〈但丁與屈原〉。這也是一篇短而沒有特別內容的小品文字。陸是中共黨人，在臺灣發表了至少六篇文章。重要的是他懂日文，因此能與臺灣的文人交往，並參與翻譯楊達日文作品的工作（楊氏的〈萌芽〉就是陸翻譯的）。陸於1949年以後逃回中國，在江蘇師範學院教書，並在1987年出版了《論語精華》。他是浙江民主促進會的活躍會員，到1990年代還擔任民進的工作。

戒嚴時期的臺灣，翻譯或介紹任何國內外的作品都是艱難的事情。所以這一段時間雖然臺灣正文書局出版了一本《神曲》，題名是王守仁翻譯，但是顯然它是王維基的譯本的翻印（王獨清翻譯的《新生》也被以王守仁之名出版）。這是戒嚴時代不得已的事。

解嚴以後的臺灣，對但丁的研究放寬了。但是由於種種的原因，臺灣的但丁研究並沒有太輝煌的成績。羅光主教在1965年發表的〈但丁生辰七百周年〉讓我們看見一個接近於所謂的「圈內人」的研究。這篇文章有一個之特色，那就是過去中國學者似乎都偏好〈地獄篇〉，但是羅光的用心則無疑的是在〈天堂篇〉。作為一個天主教主教的羅光，他對天堂的



Gustav Dore所繪但丁遇上天使押解到煉獄的基督徒亡魂。但丁跪在地上禱告。



巴金領取但丁獎。




黃國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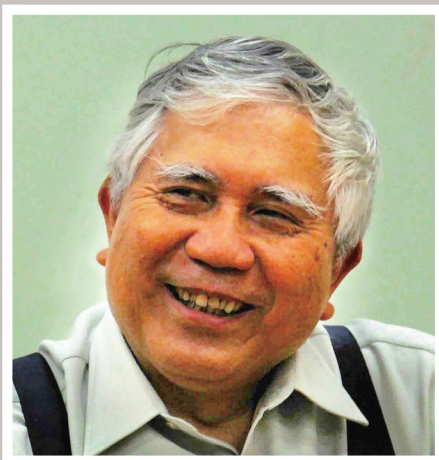
憧憬完全可以瞭解。

其他作品都沒有特別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楊牧因為不專攻意大利文，所以他重譯的《新生》也沒有特別精彩的地方。

最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黃國彬教授花了20年的功夫從意大利文翻譯的整套《神曲》由於是在臺灣出版（2003），因此我把它寫在這裏，也順便結束這篇簡直是學術論文的枯燥介紹。黃氏是傑出的詩人，所以他的翻譯不僅帶有原著的詩意，而且把握了原作的詩律及用韻的規範。他更精心做了注釋，幫助讀者瞭解並進一步做深入的研究。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地方。

這篇文章寫得太長了，就此打止。謹以此文紀念但丁逝世七百周年。

（謝謝黎明釗、黃國彬、陳善瑋教授及劉子鈞先生影印及提供相關資料。2021年6月14日端午節於紐約）



### 李弘祺小檔案

1968年歷史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市立大學、臺灣交通大學，也曾在本校、清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教育史、著有傳統中國教育的中英日德義文專書及文章數十種，以《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為最重要，獲中國鳳凰衛視國學成果獎及國家圖書館文津獎。日本關西大學《泊園》學刊稱許為「當今世上治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李教授也經常講授有關近代西洋思想的課題，主持台積電及敏隆講座。現與夫人退休於美國赫貞河畔的華濱澤瀑布。